



EJ095199524171

師大地理研究報告
第24期 民國84年10月
Geographical Research
No.24, October 1995

從都市叢林裡的新新人類談 後現代的人地關係

On th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Postmodern Human-
Environment Relations: Reflections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in Contemporary Cities and Spaces

趙建雄*

Chien-Hsiung Chao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hallenge of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in contemporary cities and spaces is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literature on the traditional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 On the one hand, globalisation -- which is partially a process of neocolonization by Western and Japanese economic power and of de-differentiation -- introduces not only new forms of world interdependence but also new conflicts within urban everyday life. On the other h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have restructured new forms of urban spaces interdependence and new impacts. This has led to the failure of much traditional research to engage in a consideration of the nature of contemporary cities in their accounts of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s a depiction of the major changes that have been taking place in cities during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postmodern urbanization schema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ese culture offers a fruitful framework for reconcil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place/space and 'urbanized human being.' The paper develops this concept; and it concludes by outlining the implications of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and invocations for geographical issues of 'contextuality' and 'place perspective'.

Keywords: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 postmodernity, urban space, geography.

*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系助教

摘要

本文自當代都會環境中的人與地現象，檢討地理學傳統中之「人地關係」所面臨的挑戰與問題。全文分為五段，除首段為緒論外，首先論及當代都會中的人——一種生活在人造環境中、遠離自然環境、心靈在虛擬真實中飄泊的人，在媒體包裝下的「新貴」假像裡，卻不乏在都市叢林中討生活的小市民悲歌。

次段則自當代都會空間敘述都會人日常生活的空間——一種深具後現代性的“地”。當代都會空間所具有的多樣性，從“波霸式立地”到“賓館式空間”，凸顯出自然環境的無用之用。

三段論及在科技發展下，處於當代都會空間中的人與地之關係。當代科技事實上已形成了異於往昔的“人與人”、“人與地”、“地與地”之關係。

末段則在前面三段的基礎上反省傳統“人地傳統”在當代所面臨的問題。當周遭生活世界已改變時，我們要如何以更具包容性的架構來涵蓋新的事物。否則地理學者對其周遭生活世界的漠視，會成為地理學研究的最大致命傷。畢竟“地理學研究”是不能遺世獨立。

關鍵詞：人地關係、後現代、都會空間、地理。

一、開場白

我們常常接觸很多新名字新名詞，其結構就是在舊有的字彙前面或後面加一個所謂前綴詞（prefix）或接尾語（suffix），但你不一定能“望字生義”，只可肯定的是新東西。“新人類”與“後現代”便是這種造字遊戲的產物。

葉智仁（民82：132）

過去的十年，臺灣歷經了鉅大的社會、經濟、及政治變遷。不僅新的事物與新的現象不斷在日常生活世界裡湧現，新觀念、新名詞、新理論亦大量出現，透過各種媒體提醒我們注意日常生活的多種複雜面貌。

本文自近二十年當代都會環境中出現的人與地現象，檢討地理學傳統中之「人地關係」所面臨的挑戰與問題。全文分為五段，除首段為緒論外，首先探討生活在人造環境中、遠離自然環境、心靈在虛擬真實中飄泊的當代都會人；其次自當代都會空間，觀照若干都會人日常生活常接觸使用的空間；其三論及在科技發展下，處於當代都會空間中的人與地之關係。末段則在前面三段的基礎上反省傳統“人地傳統”在當代所面臨的問題。

二、後現代的“人”

過去二十年裡，“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已成為一種競相角力的概念，是許多相左意見與政治力的戰場，不容再忽視之。

Harvey (1989: 39)

民國八十年底，一種上市已七年但銷售情況一直不理想的烏龍茶飲料，開始打出一系列的「新新人類」廣告（曹銘宗，民84：18-19）。「新新人類」廣告出現之後，不僅飲料銷路打開，連帶地也促使「新新人類」這個名詞普遍地在不同媒體上泛濫。「新新人類」一詞的泛濫，或許正提醒我們應深入思考當代這些“後現代人”的若干特徵。

遠離自然環境的人

自十九世紀以降，全世界人口分布的最大特徵是加速集中於都市之中。隨著全球性急遽的都市化，大型都會區、都會帶（megalopolis）及新的都市空間形態在本世紀相繼出現。全球是朝著地球市（globalopolis）發展，而非Marshall McLuhan所謂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發展（Girardet, 1992）。許多國家在本世紀均逐漸邁向都市國家（urban nation）的發展（Angotti, 1993: 1-35; Lawton, 1989）。在此種潮流之下，臺灣亦不例外。以民國82年為例，臺灣地區二千餘萬總人口中的76%，聚居在僅佔臺灣地區總面積17%的92個主要都市內；自規畫的角度來看，則是77%的人口居住在僅佔總面積12%的都市計畫區內（經建會都住處，民83）。

與都市化發展的同時，除了人口之空間分布自鄉村往都市集中的改變外，非農就業人口亦大幅度的增加，產生出大量不論是居住、抑或是工作，均遠離自然環境的人。從鉅觀的角度來看，至民國82年止，臺灣地區從事與自然環境有較大關係的初級產業人口尚不及總人口數的5%（經建會都住處，民83），絕大多數的人均從事與大自然界遠離之工作。

大都市除了人口的集中外，從工作機會的角度來看，也提供了大規模的就業機會。這些工作機會均在都會的人造環境中，造就了一大群不僅遠離自然界，且集中在人造環境中的都會人。據官方的工商普查統計資料指出，除了軍公教人員以外，民國75年臺灣的四大都會區中各產業場所雇用的總人數，98%屬於遠離自然環境的製造、營造、商業或服務業，其中臺北都會區即佔了雇用總人數的60%（見表一）！顯見都市愈大，意即愈大的人造環境中，所能提供的工作機會也愈高。

表一：民國75年四大都會區各產業場所雇用的總人數

民75年	礦土	製造	營造	商業	服務	合 計	百分比
臺北都會	3,161	679,204	126,638	558,717	393,906	1,761,626	59.91
臺中都會	420	229,080	17,211	64,972	57,621	369,304	12.56
臺南都會	517	176,961	11,213	48,268	35,055	272,014	9.25
高雄都會	547	264,101	54,084	104,179	114,553	537,464	18.28
合 計	4,645	1,349,346	209,146	776,136	601,135	2,940,408	100.00
百分比	0.16	45.89	7.11	26.40	20.44	100.00	

資料來源：據《中華民國75年臺閩地區工商普查報告》，以單位員工數計。

和所有已工業化國家（*industrialized countries*）類似，不僅臺灣大多數的人口均集中在都市地區，當代都市生活的影響亦已無遠弗屆，遍及每一個人，並不侷限居住在都市中的人。

人造環境中的人

西方早在源於天文測量的公尺取代源於人類身體的英制長度（如*yard, foot, inch*）時，空間的量度就與人類的運動沒什麼瓜葛（Benevolo, 1993）。中國古代早期的觀象主要是為了掌握農業活動之時序，後來以干支紀日及推步之術的發展，時間的量度即不再依賴對大自然的觀察（趙建雄，民83）。

今日都會中的絕對方向已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人為的地標及道路標誌；遠近距離也為相對的時間距離所取代。同時由於資本主義「把城市中每一個地段都變成可以討價還價的商品」（Mumford, 民83：374），城市的發展立基於金錢與利潤這種不具人格的基礎之上，「讓不同的人社會化成蘊藉在工業組織下之時間紀律的公共網絡中，並以錙銖必較的方式重視領域及地權之瓜分」（Harvey, 1990：419）。

都會內的活動，基本上是遵循著機械式之鐘錶時（*clock time*）與日曆的集體脈動，而不再是日出日落的自然時（*natural time*）。長週期由傳統的季節及農業生產週期轉變成西方工業社會的七日週期；曆日制度採行格勒哥里曆（*Gregorian calendar*），月是和月相無關的陽曆月，日循環則不再和太陽的昇落同步。

對當今不論是居住、抑或是工作，均遠離自然環境的臺灣都會人而言，頭頂上真正的星辰還不如算命用之命盤上的“星象”要來得引人注目；四季中的春秋，則更進一步只是服裝促銷的季節，而冬至則剩下“進補的時候”這種意義，與大自然的變化更沒有多大的關係。一如Edward T. Hall (1984: 20) 所指出的：

對一般大眾而言，終日處於所有肉體所需均完備其中的鋼鐵與玻璃所構成之“恆氣候”（*weatherized*）繭內，沒有理由需要非常在意太陽每年的日南至與日北至。專家會為我們留意這方面的事情：6月 21

日與12月22日則在不經意中消逝。

在虛擬真實中飄泊的心靈

當電腦動畫、電腦影像處理科技的快速發展，不僅電腦多媒體（multimedia）已在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進一步的虛擬真實（virtual reality）更在創造一個活生生的幻影世界。不是等到電影Jurassic Park才促使學者注意到真實與虛幻之間的問題，其實早在普普藝術（Pop Art）出現的年代，就有人注意到擬像（simulacrum）與真實（reality）的混淆問題（葉智仁，民82）。當代的科技只是更凸顯被複製的形象對社會的非真實化（derealization）以及整個周遭世界的日常真實均朝向非真實化（Jameson, 1991）。

以各種媒體上的公眾人物為例，葉智仁（民82：141）曾質疑：

我們有無認識過“真實”的劉德華、周星馳、梅艷芳、成龍……？還是他／她們只是在各種電影、電視劇、娛樂新聞、廣告、海報、MTV中重複出現的劉德華、周星馳、梅艷芳、成龍……的影像？

其實不僅是影視歌星如此，常在我們日常生活世界或耳聞、或目睹的其它公眾人物如李登輝、連戰、陳履安、陳水扁……亦然；「一個充滿形象的社會，是一個使人感覺到缺乏現實的社會，在那裡一切都是一種文本」（詹明信，民79：220-1）。

伴隨非真實化同時發展，則是所謂的“主體之死”（death of the subject）或“個人主義的終結”（the end of individualism）（Jameson, 1988），同樣是後現代社會異於傳統社會的現象之一。不僅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物如此，日常生活世界大多數的事件也如同羅生門般，只是一種文本（text），沒有所謂的真實。

日常真實的非真實化與主體的零散化或解體，所形構出的後現代社會之環境，是迥異於往昔的傳統社會。都市叢林裡的複雜性及危險性並不亞於大自然中的真正叢林，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都市叢林並不能由個人隨己之意來主宰，都會也是歷史的產物，同時兼有歷史的包袱。人造的都市叢林不僅遠離自然，並塑造出當代無數在虛擬真實中飄泊的心靈；這些在媒體種種「新貴」假像包裝下的心靈裡，不乏在都市叢林中討生活的小市民悲歌。

除了生於斯長於斯的都會新生代以外，都市叢林內尚有如葉智仁（民82：134）筆下生於傳統社會的“非新人類”：

在“新人類”還未會問這一切對他們有什麼意義之際，“舊人類”已被“應該抗拒或接納”的難題終日困擾。他們擔心下一代，擔心將要生活在“後／現代”社會的“新／人類”。

以及由都市叢林之外進入都市叢林中謀生“非新人類”¹⁾。這些已受都會環境形塑的“非新人類”與在都市叢林中土生土長的“新新人類”，也同時將都市叢林塑造成一種異於往昔的“後現代之地”。

三、後現代的“地”

倘若我們清楚後現代世界，那麼此刻就極需採用理論告知（theoretically-informed）的方式，來傳達區域差異的錯綜複雜。

Gregory (1989: 71)

當代都會不單單是人造的空間，在空間不斷成為各種消費之地（places of consumption）並成為地的消費（consumption of place）之過程中，都會人日常生活的空間同時具有許多前所未有的特徵（Sack, 1992; Urry, 1995）。當代大都會空間所具有的多樣性，從讓人為之側目的“波霸式立地”到大隱隱於市的“賓館式空間”，不僅凸顯傳統土地利用理論的不足，亦讓傳統都市結構理論遠遠落後在真實世界之後，很早就有「大多數都市地理學的理論均依據一些不再存在的城市來論斷」（Robson, 1973: xiii）之譏。在種種媒體的包裝下，這些林林總總的空間，除了展現出一種深具後現代性的“地”，並凸顯出自然環境的無用之用。

“讓男人無法一手掌握”的“波霸式立地”

麥當勞化的消費空間

1937年Mac McDonald與Dick McDonald二兄弟在美國加州Pasadena，開設了第一家採用工廠生產線方式提供快速、價廉食物的速食店。1955年四月，Roy Kroc買下MacDonald's的經營權，透過獨特的經銷權授予及經營方式，至1991年底，已建立一個擁有12,418家店面的龐大跨國企業。麥當勞所帶來的影響，並非侷限於美國或速食業界，甚至及於許多地區許多人的生活方式，形成一種通俗文化。McDonald's的經營方式，很快地影響許多速食業者，產生諸如Pizza Hut, Sbarro's, Taco Bell, Popeye's, Charley Chan's, Sizzler, Fuddrucker's, Red Lobster等等各種速食或餐廳連鎖店。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甚至被視為取代科層結構（bureaucratic structure）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替代物（Ritzer, 1993）。

在臺灣生根並本土化（localization），成為「雅痞（Yuppies）消費場所的形象」（何春蕤，民83: 6）後的麥當勞，不僅成為都會內的新地標；並透過大量的媒體廣告，成為都會新生代的休閑地。伴隨麥當勞營業成長的同時，麥當勞式的消費空間也在都會新

1)朱約信《笑魅唸歌》專集（臺北：滾石有聲出版社，民83）中的「我是神經病」及吳俊霖在《辦桌（壹）》專集（板橋：水晶有聲出版社，民80）中的「樓仔厝」，均深刻地描述了由都市叢林之外進入都市叢林中的小市民感受。

新人類成長的過程中，日漸內化成為往後都會新生代腦海內之“鄉土”的一部分。

麥當勞消費空間的產生及消費，就是在臺灣都會此一特定的歷史／地理脈絡下，形塑出了本土化。本土化的麥當勞充分借助媒體廣告，利用塑造“麥當勞地方”特色的力量來創造消費型式；消費者也充分發揮想像力，在此種地方利用商品的消費來區隔自己，並編織屬於麥當勞之地方性的文本，使得麥當勞的消費空間有別於其它傳統本土消費空間（例如永和豆漿）（參見Goss, 1992；Sack, 1988）。而傳統的本土消費空間則以麥當勞化的新空間（如改裝潢後的永和豆漿、或晚近出現的清粥小菜）來因應外來的挑戰。

同時在大眾媒體不斷洗腦之下，廣告中的麥當勞叔叔不但深深地烙在邊陲地區的幼小心靈上，又透過對地理意識之影響與地理真實的關聯，在提昇麥當勞的地位之同時，也強化了有麥當勞之都市與沒有麥當勞地區之間的差異，產生新的地理經驗。

萬客隆化與7-Eleven化的消費地

民國82年三月中旬，臺北各大報出現了一幅全版的廣告——「台北進入『後消費時代』」，宣告「一種革命性的購物方式即將出現」。其實由同一星期內，萬客隆（makro）內湖店與家樂福（Carrefour）三重店也先後放寬對「專業客戶」服務的原則，開放給一般無卡民衆購物來看，這個Shopping Mall的廣告倒是太後知後覺了。

民國64年軍公教福利中心的成立，是臺灣大賣場的濫觴，為日後量販店的設立鋪路。軍公教福利中心因服務的對象特定，對臺灣商品的流通尚未形成重大的衝擊。民國78年以倉儲式購物中心姿態在臺灣出現的萬客隆，才正式宣告一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世界逐漸興起的傳統大賣場（mass markers）、大眾流行（mass fashion）已擴散至臺灣，一個大眾消費（mass consumption）的時代正悄悄來臨。Shopping Mall的出現，除了在傳統大賣場式的消費場所提升其購物空間的品質以外，還正在塑造一種新的消費文化——“我買故我在”（self-actualisation is only the next purchase away）（Goss, 1992）。

另一方面，源於美國以銷售冰塊起家之The Southland Ice Company，將營業時間延長為早上7時到夜間11時的「便利服務」，奠下了「7-Eleven便利商店」的基礎。至民國81年，臺灣的7-Eleven便利商店數目已躍居該連鎖體系的全球第三名，排名僅次於美國與日本。不僅營業成績良好，且營業項目也日益擴展，從「都會居民的大冰箱兼廚房」進一步成為「代理郵局」、「代理銀行」，提供二十四小時的便利服務。

此二種七〇年代以後興起的零售革命（retail revolution），除了導致傳統的零售店逐漸消失；更由於絕大多數賣場之所有者與賣場所在地之間缺乏傳統商店經營者所具有之地緣關係，傳統的人地關係淪為單純的財務關係（Worpole, 1992）。

不僅大賣場或連鎖商店的空間結構對都市型態造成衝擊，當代零售業頃向於採用部份工時（part-time）、低薪資、不需要技術性、臨時性的人力，這些只懂得賣東西的店員更有別於傳統長期浸淫於工藝或技術的老掌櫃（Worpole, 1992）。

“讓你幾乎忘了它存在”的“賓館式空間” 蛋殼化的消費場所

從K書中心到MTV, KTV, HTV, DTV, RTV, TKTV, PDK, BDK, 基本上均是一種商業化的新式空間型態。由圖書館到K書中心，由八〇年代興起的“卡拉OK”到隨後的多種xTV、茶藝館，在臺灣的都會地區出現由清純路線、準色情、半色情至純色情不一的半開放式或包廂式商業空間，均屬商業化的私密性空間，反映出隨著人口密度之增加所凸顯出的空間資源稀有性，並塑造出了迥異於傳統的人地關係。

如果我們同意較開放的“卡拉OK”具有董啓章（民82：68-9）所指出的：

雖然說卡拉OK是無私隱性的，但它同時也是封閉於自我觀賞之中而反集體參與和反溝通的。我們可以〔將〕……卡拉OK的科技本體層面的內在運作邏輯歸納為兩個模式——懷想式（nostalgic）和自戀式（harcissistic）。……自戀轉化了社會空間的概念，而懷想轉化了社會時間的概念。卡拉OK是一種在共時和歷時兩軸也向內收縮的現象，它的中心點是一個空虛的，不斷移置和替代的“自我”和“現在”。

那麼很顯然地，隱私性更高的包廂式所具有之反集體參與和反溝通的特性更為強烈；所具有之社會空間與社會時間概念，更是大異於往昔的人地關係。

不能過夜的賓館

除了路線單純的“K書中心”或“xTV式休閒空間”外，臺北都會內尚有為數更多的純色情、半色情或準色情之“卡拉OK式”休閒空間。和單純休閒路線的同“類”休閒空間不一樣之處是，幾乎完全採包廂式內部空間設計，如有陪唱陪酒的KTV式的茶藝館、酒廊、酒吧或酒家，成為衆多游走在法律邊緣的休閒空間。

這些形形色色的空間在都市中創造出許多很弔詭的名詞，如錢鍾書（民68：404-5）所謂「名皆字也，而字非皆名也，亦非即名也。……《道德經》稱“老子”，白叟亦稱“老子”，名之所指舉大異，而書文道字同也」。賓館即最具有此種模糊味道（fuzziness）的例子，一如苦苓（民81：144）所指出的：

好玩的是，賓館「依法」雖是長期租人住宿的，和旅社不同，因此才允許設在住宅區……但絕大多數的賓館不接受「過夜」而只提供「休息」，這「休息」的時間也從過去的三小時、兩小時，「縮短」到據說某些「黃金時段」只有一小時了……

不僅賓館如此，都會裡許多空間，如成為休閒場所的“速食店”，讓人大快朵頤的“下午茶”，位居陸地的“海釣場”，意不在茶酒的茶藝館、酒廊、酒吧或酒家，不能理髮之“理容院”或“‘純’理髮”……等等；以及伴隨新空間同時出現的諸如服侍客人的“少爺”，不太清純的“公主”，專門陪酒的“公關經理”，沒有特定停車空間的“泊

車”業……等行業；這些現象／名詞只有在臺灣大都會的脈絡中才具有其特殊意義。不熟悉此種脈絡意義的人，是很難“望字生意”。

對都會裡這些商品化的空間而言，真實地理上之“消費地方”僅存在商品的文本（commodity's context）之中。許多現象以及現象所塑造出的地方，均是特定歷史／地理下的產物，其名詞就必須在特有之文本中，才具有明確之意義。同時，「空間已不僅然是更整合的，而是更如同地盤般地片斷。地方是更特定或獨特的，但就許多方面而言，是更呈現一般化與相似的。地方似乎是已在“那兒”（out there），卻是人所建構出的」（Sack, 1988 : 642）。

不僅都會許多名詞具模糊味道，在麥當勞進駐臺北之時，連帶地產生了朱約信（豬頭皮）那首「IF U 惦惦 NO BUDY SAY U 矮狗」（Taiwan Language Battle）歌中所描述的

走在煩嘩的台北市
舉頭看招牌都是外國字
ABCD狗咬猴咬豬
PACHINKO的邊仔〔是〕KTV
KENTUKEY有在賣炸雞
TOWER的內底咧賣CD
SOGO的五樓有咧賣SANSUI
光華商場的樓腳有PLAYBOY

文化衝擊；而且其中不乏詹宏志（民78：圖6）所指出的：

MTV店是臺灣特有的怪商店，它使「24H・MTV」成爲一種無漢字的中文，透過英文是無法理解的。

均是新文化衝擊下所建構出的新地方感（sense of place）之例子。

無用之用的自然環境

今日都市已是絕大多數野生動物的沙漠，地景（landscapes）也拱手讓給了“人景”（manscapes）（Girardet, 1992）。相形於後現代都市內形形色色、且高度利用的人造環境之下，許多傳統的自然環境角色也爲之改觀²⁾。當代大自然的角色相對地要比其傳統角色來得詭譎，多數自然環境的利用，是“無用之用”。以當代最需要維持其“自然”特色之水資源保育區爲例，此種自然環境就是一種一利用就毀滅的大自然。其它如傳統上被認爲是天然災害的颱風，現在反而成了臺灣當前水資源的重要來源，颱風不來才形成

²⁾有關西方近二百年來人與自然關係之變遷的簡略回顧，可參閱Lash and Urry (1994 : 292-305)。

乾旱的天然災害。成爲《老子》所謂：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
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的一個「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現代版例子。

不僅大自然之用在於其“無用之用”；在一片綠色的環保呼聲中，自然也淪爲一種類似“鄉愁”的感覺。和其它本土化運動一樣，是要回到一個目前已快消失或根本不再存在的過去。

四、後現代的“關係”

後現代主義之方法論中的關鍵要素之一是解構（deconstruction）。

地景可以像閱讀本文（text）般地閱讀，其中意義的層次也可剖析與分析。

Winchester (1992: 140)

不在場的目擊者與參與者

科技的發展已戲劇性地改變了傳統時間與空間的關係。交通與通訊／傳播媒體的分離，導致所謂“在場性”（presence-availability）的改變（Giddens, 1984），不同時空的人在全球快捷的通訊網路下，都可以發生互動的關係。電話可以使得相隔千里之遙的人們，享有傳統只有在面對面溝通才可能出現的言談互動方式；大哥大更是進一步解放電話線的束縛。現場立即轉播的電視節目，也製造出了成千上萬的“不在場目擊者”，在不同的地方脈絡下“瞬時”目睹其它地方事件的發生（Thompson, 1990; Meyrowitz, 1985）；透過錄影機的普及，使得“現場”可以一再重播，但卻不保證就是真實（呂政達，民84）。傳統單向傳播的廣電媒體，也因電話而充斥雙向式的“call-in”節目。此種傳播科技事實上已形成了異於往昔的“人與人”、“人與地”、“地與地”之關係。

在前述各種品味之xTV、茶藝館、酒廊、酒吧、酒家或賓館等蛋殼化的消費場所中，包廂式真實物理空間的私密性，卻也因電話或大哥大所具有的超越空間障礙來建立即時性人際互動之能力，而成爲動態的私密性；並讓不同空間之間的關係成爲一種動態式的關係，隨電話或大哥大的使用與否，形成是否有不在場的參與者，來決定物理空間的私密性。這些商業空間使用者的高流動性，更進一步促使電話或大哥大所建立起之動態關係之空間結構的不穩定與易變性。

而在更高科技的領域內，雖然在虛擬真實世界中看不到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但在四通八達的電腦網路所建構出的網路空間（cyberspace）裡，卻是由一群在實質空間中分散在天南地北之人共同組成的大千世界。透過電腦網路，這些遠近不一的電腦族可以在相同時間（？）或不同時間互相分享心得，與不同國籍之人互相交流。通訊與電腦的

結合，已重新向傳統的“在場”一詞之內涵挑戰。傳統的三度空間在當代的電腦網路上，已被壓縮得只剩下維的一條電線；在電腦網路的空間裡，或者用電腦族的行話來說，生活在電腦城（cybertown）中，“在不在場”已為“在不在線上”所取代。

當農夫成為農商

資本主義支配下的世界，許多傳統的事物往往會因新的關係之形成而異於往昔或異化。以經濟活動中的農業為例，捲入資本主義世界的農人，雖然處於都市之外，卻早已脫離傳統的自給自足經營方式。市場導向的農業經濟，不僅產生新的農商（agribusiness），並透過國際化的物流管道供應全球化的市場（Knox and Agnew, 1994），在各地形成新的“人與人”、“人與地”、“地與地”之關係。「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的時代已為“粒粒皆剝削”的時代所取代。

儘管臺灣進入GATT的談判尚在進行中，民國83年4月下旬的某一天，當我在公館的肯德基炸雞店裡吃著炸雞塊時，不經意中發現炸雞塊上的蕃茄醬是來自美國Pittsburgh的Heinz Tomato Ketchup，而草莓果醬則是產自雲林縣斗六工業區，並用新加坡製的紙杯喝著不知來自何處的柳橙汁。顯然型塑“四海一家生活方式”（cosmopolitan lifestyle）的今日都會中之許多“關係”，已在不知不覺中隨著資本主義支配力的擴張，而使當代都會內所見到的傳統農業之角色有所變化。商品化後的農產品，不論是在市場上、抑或在廣告中，均讓消費者與其產地或生產者疏離。傳統經濟地理教科書中介紹的農業活動，早已遠遠落後真實日常生活世界的變遷。

時空機制作弄下的公權力

民國82年加拿大一對年輕夫婦涉嫌謀害二名女孩，七月間加拿大 St. Catharines 法院審理本案的法官以報導先宣判之妻子的證詞將影響丈夫獲得公平審判機會為由，下令禁止加拿大的媒體公開報導兇殺案在法庭進行的經過。但鄰近的美國城市如Buffalo的各媒體卻大量報導本案，使加拿大人透過美國的媒體便輕易獲得整個審判的資訊，而加拿大的法庭卻束手無策。

次年，無獨有偶，每回都因在MTV中作風大膽，在臺灣播放均會遭到新聞局大剪修理的Madonna，新聞局卻還沒開始傷腦筋要如何修剪其新的1993年10月在澳洲巡迴演唱實況錄影，HBO便在六月18日完整播出。透過衛星與第四臺，臺灣的觀眾也可欣賞到一刀未剪的「性感女神熱力歌舞」。新聞局的大剪在面臨距離遙遠的衛星時，同樣束手無策，成為傳統的公權力必須因應結構新社會／空間關係的時空機制之臺灣例子。

五、前現代（？！）“人地傳統”的迷思

我是正統學說，你是異端邪說。

引自 Harvey (1972: 323)

近二十年來臺灣一般大眾日常生活世界的快速變遷，已迫使我們必須正視今日都會內或受都市生活方式所影響之絕大多數的人，包括人地關係在內的種種“關係”。在面對不斷汰舊出新的真實世界之同時，尚必須去思索地理知識的因應整合體系或方式。

“三大傳統”？？

在臺灣頗具影響的“Pattison-Taaffe/Haggett-施添福”（1964-1973-1980）之“三大傳統說”（施添福，民69a，民69b，民72），是否那麼放諸四海皆準，就很值得商確了。即使姑且不論其中的空間傳統在臺灣是否存在，單就美國地理學的繫絡而言，以臺灣版的“Pattison-Taaffe/Haggett-施添福”之“三大傳統說”就很難說明，何以1984年美國《初級與中等學校地理教育指引》（*Guidelines for Geographic Education -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會認為地理學的五大主題：「區位」（location）、「地方」（place）、「人與環境互動」（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移動」（movement）、及「區域」（regions），可以做為地理教學中用來組織觀念之教導架構（instructional framework）；而到了1994年又進一步發展成只有「空間與地方」（space and place）、「環境與社會」（environment and society）、「空間動態與聯繫」（spatial dynamics and connections）三大內容之學習成果的評量架構（assessment framework）（NAGB, 1994；AAG/NCGE, 1984）。

例如，如果我們把上述「地方」解釋為區域傳統的內涵時，要用“Pattison-Taaffe/Haggett-施添福”版之“三大傳統說”來理解何以五大主題中之「地方」和「移動」會獨立出現，就很困難了；同時更不容易解釋何以晚近三大內容中的「空間」會與「地方」合併。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二個例子均非某位學者的一家之言，在1989年開始制定的美國「國家教育目標」（National Education Goals）下之美國「國家地理學教育標準」（National Geography Standards）1993年的草案中，都被納入成為發展美國國家地理教育標準的基礎（NCGE, 1993）。

不同文化及不同社會背景下知識體系的整合，不必然會具有相同的整合方式。某一種整合方式不見得適應另一種情境，在多元化的社會下更不會只有單一的一種整合方式。雖然英美所發展出的種種整合方式不見得均適用於臺灣的情境，但它山之石至少可以攻錯。

本文主旨並非批評“Pattison-Taaffe/Haggett-施添福”這種知識整合架構的不妥，實際上這是一個結合自然與人文地理很不錯且極其具有特色的整合架構。比起展現在現行中學或專科地理教科書中，所長期堅持採用那種在本世紀初所發展成的

“地形 + 水文 + 氣候 + 聚落 + 交通 + 土地利用 + …… = 地理學”

或者是

“廣東 + 廣西 + 福建 + 浙江 + 山東 + …… = 中國”

方式的‘地理常識／知識“混合”架構’，認為個別樹木之和即等於一個完整的森林來，不論就何種層次而言，“Pattison-Taaffe/Haggett-施添福”版知識整合架構所顯示的價值及其所超越的成就，都不可以道里計。

雖然“Pattison-Taaffe/Haggett-施添福”版整合架構除了在各別樹木之外讓我們認識了森林，不過我們卻不應誤認爲這是整合地理知識“唯一”或“最佳”的架構，而不再思索周遭世界變遷下的新地理知識如何再整合之問題。

遺世獨立的“地理學研究”

1991年英國地理學會（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的年會裡，由R.J. Johnston籌組了一場名爲「變遷的世界：變遷的學科」研討會，十位與會的論文發表人中的九篇論文，後來集結成《地理學的挑戰》（*The Challenge for Geography*）一書（Johnston, 1993）。Johnston在這本書的導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當世界變遷時，地理學也跟著亦步亦趨地變。

是以歷年不斷有學者對地理學的現況與未來的展望關注，例如R. J. Chorley於1973年主編的《地理學的方向》（*Directions in Geography*）、D. Massey與J. Allen於1984年合編的《地理學集要》（*Geography Matters!*）、R. J. Johnston於1985年主編的《地理學的未來》（*The Future of Geography*）、M. J. Clark、K. J. Gregory及A. M. Gurnell三人於1987年合編的《自然地理學的視野》（*Horizons in Physical Geography*），1989年甚至有D. Gregory與R. Walford合編的《人文地理學的視野》（*Horizons in Human Geography*）、R. Peet與N. J. Thrift合編的《地理學的新模式》（*New Models in Geography*）、B. Macmillan主編的《重塑地理學》（*Remodelling Geography*）、J. R. Wolch與M. J. Dear合輯的《地理學的力量》（*The Power of Geography*）以及A. Kobayashi與S. Mackenzie合編的《再造人文地理學》（*Remaking Human Geography*）等五本書問世。

這些著作不僅回應了約七十年前德國地理學者 Alfred Hettner（民72：6）的一席話：

從某種程度看，科學的歷史必須是目的論的，即是說必須歸結於現代；
因爲問題在於從其發展中來理解現代。

同時也提醒我們去思考，當周遭生活世界已改變時，我們要如何以更具包容性的架構來涵蓋新的事物。否則地理學者對其周遭生活世界的漠視，會成爲地理學研究的最大致命傷。因此，不是人地傳統或其它傳統在當代地理學中已不再存在或沒有存在的價值了；而是隨著新事物之刺激，促使新的傳統不斷地產生。不僅是人地傳統，其它的二大傳統亦成爲地理學內諸多傳統的一部分，繼續吸引著一部分的學者以其爲明燈來指引研究的進行。老傳統和老兵一樣，都是不會死的——只是逐漸凋零。

所以不必訝異諸如Cloke, Philo and Sadler (1991) 的說法，所謂三大傳統好像只是七〇年代或八〇年代以前的包袱，六〇年代以後在人文地理學內至少還先後發展出了馬克思主義取向（Marxist approaches）、人本取向（humanistic approaches）、造構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現實論取向（realist approaches）、後現代人文地理（postmodern human geography）等不同的研究取向。

七〇年代時的地理學勉強還可以用實證論、現象學、及批判取向（critical approaches）的典範（paradigms）來概括地理學（Claval, 1993; Gregory, 1978）；而八〇年代以後，在後現代的一片解構（deconstruction）聲中，地理學者卻發現「典範的概念在今日已不復流行，昨日主要的潮流也罕見提及」（Claval, 1993: 239），後現代同時也是後典範（post-paradigm）（Gregory, 1989），林林總總的各種研究取向，只能統括為後實證人文地理（postpositive human geography）（Gregory, Martin and Smith, 1994: 1-18）。到今天，不僅談空間、談空間中的區位得和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掛鉤（Werlen, 1993; Gregory, 1994）；甚至八〇年代後期興起的“‘新’區域地理”（new regional geography），在Ronald J. Johnston的《地理學與地理學者》（*Geography and Geographers*）一書中，因為大異於傳統的區域地理，被歸入「激進取向」（radical approaches）一章中（Johnston, 1991: 249-251）。

當代地理學發展的腳步之快，一如Reginald G. Golledge所指出的「今日的地理學已和我們生活的世界一樣複雜。地理學者遊蕩在傳統學科領域極遠之外，……促使這門學科成為最有趣及最能滿足知識探索的學科之一」（Golledge, 1991: 146）。如果我們還堅持地理學內只有三大傳統，那麼我們又如何和包括後現代地理學——或者照Ferrier (1993) 的說法，是第三度現代化的地理學（geography of the Third Modernity）——在內的這些已經不是很新的“新事物”對話呢？或者如何去回應女性主義（feminism）對地理知識的質疑（例如Rose, 1993），或回應空間化（spatialized）地解讀馬克思的物本（唯物）辯證（如Merrifield, 1993）呢？

面對「如果要以截至1965年既有的都市發展知識，當做預測1970年代都市發展之起點，必然會冒與實際所發生完全不相關的風險」（Nystrom, 1992: 133），這樣的世界，在我們尚未釐清我們所謂的“地理學”是那裡的地理學？又具有什麼樣的“傳統”之前，就要以“過去”的知識來教導“現在”的學生去應付“未來”的問題，顯然是不足且有問題的。在傳統這個包袱裡，不是樣樣俱佳，都可以享用千年不被淘汰；也不是事事皆不可取，均應澈底拋棄。誠如Alasdair MacIntyre所指出：「充滿活力的傳統是蘊藏著連續的衝突」（引自Livingstone, 1992: 347），如何以開放的心靈來包容快速變遷的世界，顯然是一個重要但已不新鮮的舊課題。

我們很清楚地意識到 Peter Gould (1982: 2) 所指出的

討論的方式——通常為矯飾的問題所打斷——本身即為特定歷史時間

下的產物。無可避免的，我們是時間的主要部分（或者是時間的俘虜？），然而我們也有細加考量正是此種事實（fact）的能力。

所以當我們在批評學界外之人在介紹地理學時，可以大聲說：

雖然金耀基說過：「有歷史的通道，就不會飄浮；有時代的氣息，則知道你站在那裡了！」，但在後現代的今天——尤其是英語世界之「地理」一字已開始用複數geographies的今日——有時候銜接不到當代的歷史，卻會讓人迷失在當代的洪流中；不免難逃法國文豪福樓拜（G. Flaubert）在上世紀所指責的：「現代化的愚蠢並不是無知，而是對各種思潮生吞活剝」。（趙建雄，民81：164）

儘管公理正義因相對化而不復再具有往昔的價值，但如果地理學面對文學家的質問：

當前臺灣社會，我們在誇耀改革和創造績效的同時，所見到的是光怪陸離、雜亂無章的現象；幾乎無一事沒有反彈，無一時沒有抗爭。而此一「發言人」，彼一「代言人」，相互指摘，咆哮不已。因此，我們不禁要問：為公理正義而作「不平之鳴」的作品在哪裡？為沈默大眾作「代言人」的作家，又在哪裡？（司徒衛，民83）

卻對其中的現象顯得漠不關心時，則是否意味著地理學只對烏託邦而非現實世界有興趣。所以在「地理敘述問題」（problem of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已成為當代人文科學的「表徵危機」（crisis of representation）之一部分時（Gregory, 1989），顯然需要學界投入更多的關懷，來關注當代的社會、當代的人及當代的問題。「了解包括地方建構及地方對生活之影響在內的許多因素，即是現代世界之地理的首要任務」（Sack, 1988：642）。不僅這樣才足以回應Alfred Hettner（民72：3）的老話：

各種科學的形成，每種科學所提出的問題，都不是隨心所欲的，乃是
出於每個時代所特有的需要，每個時代所有的知識和能力。

畢竟，「地理學是築基在許多不可避免的問題之上」（Ferrier, 1993：252）。

（附記：本文係作者於84年11月1日至本系發表演講之原文。）

參考文獻

司徒衛（民83）：〈代言人〉，聯合報，7月28日37版。

行政院經建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民83）：《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何春蕤（民83）：〈臺灣的麥當勞化——跨國服務業資本的文化邏輯〉，《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6：1-19。

呂政達（民84）：《偷看：解讀臺灣情色文化》，臺北：張老師文化事業公司。

- 施添福（民69a）：〈論地理學的結構〉，*思與言*，17(5)：419-441。
- 施添福（民69b）：〈地理學中的人地傳統及其主要的研究主題〉，*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研究所地理研究報告*，6：203-242。
- 施添福（民72）：《我國中學的地理教育：反省與展望》，*地理研究叢書第三號*，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 苦 荃（民81）：《醜陋的台灣人》，臺北：太雅出版公司。
- 曹銘宗（民84）：《臺灣廣告發燒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葉智仁（民82）：〈新人類與後現代影像消費〉，收入《香港普及文化研究》，史文鴻、吳俊雄主編，頁132-148，香港：三聯書店。
- 董啓章（民82）：〈自戀與懷想——卡拉OK現象探討〉，收入《香港的流行文化》，梁秉鈞編，頁58-76，香港：三聯書店。
- 詹宏志（民78）：《城市人》，臺北：經濟與生活出版公司。
- 詹明信（F. Jameson）（民79）：《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增訂本，臺北：合志文化公司。
- 趙建雄（民81）：〈拋磚之憾——回應後記〉，*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2：159-165。
- 趙建雄（民83）：〈中國傳統時空結構化之早期發展〉，*國立臺灣大學地理學系地理學報*，17：169-184。
- 錢鍾書（民68）：《管錐編》，北京：中華書局。
- Hettner, A. (民72)：《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Die Geographie: Ihre Geschichte, Ihr Wesen Und Ihre Methoden*)，1927，王蘭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Mumford, L. (民83)：《歷史中的城市——起源、演變與展望》(*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1961；宋俊嶺、倪文彥譯，臺北：建築與文化出版社。
- Angotti, T. 1993: *Metropolis 2000: planning, poverty and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and National Council for Geographic Education 1984: *Guidelines for geographic education in 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 Benevolo, L. 1993: *The European City*. Trans. by Carl Ipsen. Oxford, UK and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 Claval, P. 1993: Modern ge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reality. *GeoJournal*, 31(3): 239- 245.
- Cloke, P. Philo, C. and Sadler, D. 1991: *Approaching human ge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 Featherstone, M. 1991: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
- Ferrier, J.-P. 1993: Post-modern geography or geography of the Third Modernity. GeoJournal, 31(3): 251-253.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rardet, H. 1992: The Gaia atlas of cities. London : Gaia Books.
- Gould, P. 1982: Prologue: 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In A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ed. Peter Gould and Gunnar Olsson, pp.1-7. London: Pion.
- Golledge, R.G. 1991: Special populations in contemporary urban areas. In Our changing cities, ed. John Fraser Hart, pp.146-169.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Gregory, D. 1978: Ideology, science and human geography. London: Hutchinson.
- Gregory, D. 1989: Areal differentiation and post-modern human geography. In Horizons in Human Geography, ed. Derek Gregory and Rex Walford, pp.67-96. 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lan.
- Gregory, D. 1994: Social theory and human geography. In Human geography: society, space, and social science, ed. Derek Greogry, Ron Martin and Graham Smith, pp.78-10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regory, D., R. Martin, and G. Smith, ed. 1994: Human geography: society, space, and social sc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oss, J. 1992: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in the retail landscape. In Inventing places: studies in cultural geography, ed. Kay Anderson and Fay Gale, pp. 159- 177. Melbourne: Longman Cheshire.
- Hall, E.T. 1984: The dance of life. New York: Anchor Books.
- Harvey, D. 1972: On obfuscation in geography, a comment on Gale's heterodoxy. Geographical Analysis 4(3): 323-330.
-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MA and Oxford, UK: Blackwell.
- Harvey, D. 1990: Between space and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0(3): 418-434.
- Jameson, F. 1988: 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 In Postmodernism and its discontents, ed. E. Ann Kaplan, pp. 13-29.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Jameson, F.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Johnston, R.J. 1991: Geography and geographers: Anglo-American human ge-

- ography since 1945. 4th ed., London and New York: Edward Arnold.
- Johnston, R.J. , ed. 1993: The challenge for ge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 Knox, P. and Agnew, J. 1994: The geography of the world economy. 2nd ed., London: Edward Arnold.
- Lash, S. and Urry, J. 1994: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SAGE.
- Lawton, R. 1989: Introduction: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role of great cit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cities, ed. Richard Lawton, pp.1-19. London and New York: Belhaven Press.
- Livingstone, D.N. 1992: 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 Merrifield, A. 1993: Place and space: a Lefebvrian reconciliation. Trans. Br. Inst. Geogr. N.S. 18(4): 516-531.
- Meyrowitz, J. 1985: No sense of place.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tional Assessment Governing Board 1994: Geography framework for the 1994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ssessment Governing Board.
- National Council for Geographic Education 1993: Geography for life: National geography standards (Draft).
- Nystrom, J. 1992: The cyclical urbanization model: a critical analysis. Geografiska Annaler B, 74(2): 133-144.
- Pattison, W.D. 1964: The four traditions of geography. Journal of Geography, 63(5): 211-216.
- Ritzer, G. 1993: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London: Pine Forge Press.
- Robson, B.T. 1973: Urban growth: an approach. London: Methuen.
- Rose, G. 1993: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Polity.
- Sack, D. 1988: The consumer's world: place as contex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8(4): 642-64.
- Sack, D. 1992: Place, modernity, and the consumer's world.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Taaffe, E.J. 1974: The spatial view in contex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9(2): 133-8.
- Thompson, J.B. 1990: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 Urry, J. 1995: Consuming plac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Werlen, B. 1993: Society, action and space: an alternative human geography. Trans. Gayna Wall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Winchester, H. 1992: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women's roles in the urban landscape. In Inventing places: studies in cultural geography, ed. Kay Anderson and Fay Gale, pp. 139-156. Melbourne: Longman Cheshire.
- Worpole, K. 1992: Towns for people. Buckingham and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